

增訂版序

此番中文版《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經過增訂，終於面世。此書初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2006年2月推出，到如今再版，已過去15年。其實，初版面世後幾年即告售罄，當時出版社計劃至遲於2011年（建黨90週年）再版此書。然而這一計劃長期未得實現，就這樣過去了十多年，今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刊行繁體中文版。首先，要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致以深摯的謝忱，如果沒有他們的積極推進，本書再版的計劃將長期懸而不決。

初版刊行之際，由於跟出版社溝通不甚順暢，著者與譯者均未及確認校樣，書稿就倉促面世。為了彌補這些缺憾，當時遂計劃將再版仍交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訂正一些錯字和誤譯，並增補初版遺漏的索引與中文版序言，僅作最小限度的修正。然而這類書籍在中國大陸就算只是再版，也需要重新報批、審查。因此，雖提交了再版書稿，但等待過程中，大陸的出版管制變得更為嚴格，審查結果遙遙無期。在這期間，本書英文版的刊行倒一切順利，*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已於2012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譯者是加拿大約克大學的傅佛果

(Joshua Fogel) 教授，而北京那邊的再版計劃仍杳無音訊。因此，我們判斷如今在大陸再版此書已困難重重，遂將增訂書稿交付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終於順利刊行。

因為再版拖延太久，又長期絕版，每每被中國研究者問起何時再版，總是不能明確告知，在我來說也是很大的壓力。不過，也正因再版遷延日久，如今才能在增訂版裏很好地反映出近年的學術成果，增補新的觀點。如此，增訂版內容也更為豐富，或許也算轉禍為福。

其實，2006年本書的刊行能在中國黨史界、史學界引起相當的反響，我心中很覺喜悅。特別是此書在中國受到了與在日本完全不同的關注：在日本，除了一小部分專家，本書的日文版(岩波書店，2001年)幾乎沒有引起什麼像樣的回應，就長期處於絕版狀態；與之相比，中文版雖然也同樣是絕版，卻有許多讀者想要閱讀而求之不得。更令我喜悅的是，在中國，學術界對此書的評價超越了單純的、對外國人所撰中共建黨史專著的新奇感，更多是認可了本書的學術價值，在評價本書意義時，也將本書視為黨史研究領域的真正競爭對象。

不過，這些反響當中，也包括不少批判與論爭。據我所知，截至目前大概有近30篇相關書評、評論刊載於中文報刊和學術雜誌(參見「主要書評目錄」)。在中共黨史主題的學會上，也有幾篇以討論本書為中心的研究報告。這些文章基本都高度評價了本書精緻的考證與新觀點，但令我震驚的是，有幾篇書評對我作為研究者的資質或學風進行了攻擊，是某種高壓式的批判。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曾佔據《光明日報》整個版面的書評特輯(2006年8月28日)。

該書評特輯由三篇主旨幾乎相同的評論構成，強調了以下內容：1980年代後期，中國已有人指出最早將馬克思主義介紹到中

國的先驅者、本書中高度評價其功績的人物「淵泉」是陳溥賢的筆名，而石川卻吹噓得彷彿是自己的最新發現。因此，「石川對中國學者已有研究成果的肆意歪曲，說明他的學術品格令人懷疑」云云。該特輯的「編者按」也表明了這樣的立場：「這三篇文章……不僅指出石川禎浩對『淵泉』的所謂考證是假命題，而且還觸及到學術界的學風問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很有現實針對性，很值得當今學人冷靜反思。」

對於這種近乎中傷的評論，立刻又有中國學者提出反論，指出基於曲解的人格誹謗已超出了學術著作評論的範疇，並強調有必要進行冷靜的學術性對話（參見「主要書評目錄」14、18、20）。包括這樣辛辣的批判在內，有關針對本書提起的種種問題與懷疑，增訂版當中也時常提及，闡明了筆者的立場。

此外，本書對初版作出的比較大的修訂，主要有以下四點。

(1) 更加詳細地說明了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1921年）的中國代表權問題。一直以來，共產國際第三次大會被認為是中共代表（張太雷）首度正式參加的共產國際大會。而其實在這次大會上，除張太雷之外，江亢虎與姚作賓等自稱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們也先後來到莫斯科，他們在莫斯科展開了正統之爭。筆者利用莫斯科檔案館的資料，說明了其中的始末。同時更明確地指出，過去被認為是中共派遣的代表張太雷，其實並非受中國國內黨組織的派遣，而是受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局的指示與推薦，作為中共代表參加了會議。也就是說，他並非事先由中共正式任命的代表。此外還考證出中共派遣的正規代表楊明齋雖也來到了伊爾庫茨克，但最後卻未能順利抵達莫斯科。通過確認大會出席者的情況，他們當時帶去莫斯科的資料的可靠性也變得頗可懷疑（對於這些資料，過去一直基於無條件信賴的前提而使用）。

(2) 有關中共「一大」的中國出席者名單，一直被認為有13人，而大會記錄上的代表數只有12人，這當中沒有被算進去的人物是誰呢？本書初版中曾推測是陳公博，如今增訂版中則推定為何叔衡。將何叔衡排除出代表之列，是根據張國燾（1938年脫黨）回憶錄（1970年代）而來的說法，但過去研究界對張的回憶錄一直有所懷疑，理由是不可太信任脫黨分子不負責任的捏造。然而，筆者嘗試重新分析各種資料之後，發現張國燾在1920年代末撰寫的有關「一大」的演講記錄中，也有同樣的見解，即未將何叔衡視為「一大」代表，而當時張還是黨的領導人。因此，對照同時代的其他資料，增訂版提出了新說，即何叔衡並非「一大」代表。

(3) 指出中共「一大」的閉幕日，也就是嘉興南湖會議的日期當在8月3日（初版曾認為是7月31日）。本書初版中提出，應考慮到8月1日南湖暴風雨等要素來考證大會日程。其後，中國學界也考慮到當時的氣象因素，對此展開了大規模的詳細調查，從而得出更合理的結論，即8月3日在南湖的遊船上舉行了閉幕日的會議。筆者同意此說，並訂正了舊說。不過，我想再次強調，與上述(2)闡明的問題一樣，代表名單也好，大會日期也好，這些問題並非中共成立史研究的本質。

(4) 中共「一大」後來如何被紀念和慶祝，相關資料又是如何形成？為說明這些問題，增訂版特增終章一篇，考證了1949年之後，留在中國大陸的四名「一大」參會者（董必武、李達、包惠僧、劉仁靜）如何記憶「一大」開幕日，又如何將這種記憶反映在回憶錄中。為了紀念大會，種種必不可少的詳細信息中（何時、何地、何人），最難記住的是大會日期，而相關參會者的回憶與他們各自的社會地位也有着密切關聯，這在終章中得到了具體的闡明。此外本書還強調，對於這些回憶，若不考慮當事人的立場及他們時常參考的資料就加以利用，是沒有意義的；終章同時介紹了這四

位被寄予憶起大會日期的希望的人士怎樣度過了他們的後半生，由此結束本書。

在以上四點之外，還有若干細小的修正，不過，本書初版的根本主張完全沒有變化，即應當在國際性的契機中理解中共的成立。本書指出，在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方面，中國受到過日本的很大影響；蘇維埃俄國和共產國際的動員曾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而本書在中國受到的批判大多在於過於強調國外因素對中共成立的影響。但這是史實，即便被批判，也不會撤回。

反過來講，如果非要說即便不受國外的影響，基於中國人的自主性及獨立性早晚都會建成中國共產黨；這種可能性固然無法否定，但那個完全獨立自主的「中國共產黨」，恐怕要比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晚很久才出現。早在1980年代初，北京大學的向青教授就曾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受到共產國際的很大幫助，這並無需諱言，因為我們不能以今日的價值基準和組織觀念去想像當時的結黨活動。今年正值建黨100週年，比起本書日文版面世的2001年（建黨80週年）和中文版初版面世的2006年（建黨85週年），應該會湧現更多的相關研究。不過，雖然有這些本土研究，我確信本書依然擁有未曾過時的內容。

◆ ◆ ◆

這些年來，因為從事中共創建史的研究，我收穫了這一領域的諸多知己。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各位老師。在此，請允許我稍稍回顧自己的往昔。

我第一次拜訪「一大」會址，是在1986年7月。當時我剛剛結束了1984年至1986年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留學生活，正準備返回日本。兩年的留學中，我努力去往中國各地旅行，增廣見聞。當然也盡量去上學校開的課，但兩年當中，實際上幾乎有250天都在旅途中。1980年代後期，在正處改革開放發展時期的中國旅行

雖有許多不便，但其時的經歷成為我理解中國的重要原點。在設計旅行路線時，我特意將上海留到了最後。因為在我心中，上海和北京一樣，都是很特別的地方。於是在結束留學生活、離開北京之後，我將上海作為了旅行的最後一站，那之後就離開了中國大陸，經香港、台灣回到日本。

翻開當時寫下的日記，原來在1986年7月22日，我去了上海的「一大」會址。不過日記的記述極為簡略，只寫了當天下午四點後的半個小時之內，在講解員的引領之下，與其他五、六名參觀者共同參觀了會址；「一大」會場的小房間內放着複製品的桌椅；會址北側有兩間陳列室。此外沒有寫下任何感想。而在參觀會址之前我還去了上海博物館，關於那裏的藏品和建築物，我在日記裏作了詳細的說明，並多有讚語。相比之下，我對「一大」會址什麼感慨都沒有。30分鐘的短暫參觀時間說明了當時我對中共黨史沒有多少關心，同時也說明當時館內的陳設極為簡單。

但是，最近我又調查了「一大」會址陳列品的歷史，這才知道當時「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展覽內容已有了大幅革新。也就是說，那年7月1日開始，陳列室首次將出席「一大」的中國成員照片全部展示了出來。在那之前，中國所有的紀念館都不會將這13人全部展示。因為那當中有幾位後來的「叛變者」。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這樣的政治性色彩逐漸淡化，從而促進了「一大」會址陳列室內容的變化。就「一大」會址的歷史來說，或者從中共創建史研究的歷史而言，這稱得上極為巨大的變化與轉折點。也就是說，我剛好趕上了「一大」會址經過巨大革新、重新開放的時候。但從當天的日記來看，那時的我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一切。

那之後又過了三年，1989年7月，我再度造訪了「一大」會址。那是「六四」後因擔心留學時代結識的北大學友們的安危，便

獨自前往戒嚴令之下的北京，隨後去了上海。當時我正在京都大學念碩士研究生，碩士論文題目選擇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史與日本的關係，為了調查1920年前後刊行的社會主義相關書籍的底本，我特地從北京去了一趟上海。前往「一大」會址紀念館，也是為了調查該館所藏《馬格斯資本論入門》（李漢俊譯，本書附錄二，A12）的底本。那是7月10日，對於我的突然造訪，陳列室主任俞樂濱先生欣然許可，竟擰開了密封陳列櫃的螺釘，將擺在其中的這冊書拿給我看。我在日記裏寫道：「極為感激。」本書附錄的書籍目錄，就是在這樣的過程裏完成的。三年後，曾經匆忙看了一眼展覽的我，受到許多像俞先生那樣的學界同行前輩的幫助，開始真正深入中共創建史的世界。

後來，算上出入境時路過，我大概去了上海二十多次，每回只要時間允許，一定會去參觀「一大」會址紀念館。展覽內容經常有些大大小小的變化，確認這些變化是我參觀的最大目的。譬如前面說的13位參會者的照片，最初大小和排列順序有嚴整的序列，最上面是毛澤東等終身黨員的大幅照片；中間是中途脫黨、但支援革命的人員的小照片；最下面是不僅脫黨、還成為「漢奸」或反黨分子的人員，他們自然也是小照片。到後來，政治色彩逐漸淡去，這些照片的排列方式又有了改變。

這期間，因為本書中文版初版面世的契機，我也有了不少機會參加該紀念館的相關學會和資料調查活動，並有了更多機會聽取已經相熟的研究員和館長圍繞展覽所作的種種說明和努力。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關若干年前展廳內蠟像群的逸聞。在紀念館二樓，有再現「一大」場景的一角，如今陳列的是白銅雕像（下頁右圖），而那之前的2001年至2016年的15年間，曾經陳列過精巧的蠟像（下頁左圖）。



蠟像陳列室(2001–2016)
× 為尼克爾斯基



白銅雕像陳列室(2016–)

究竟更喜歡哪種，固然全看觀眾個人喜好，但據說在普通人看來，蠟像總歸更活靈活現一些，而白銅雕像則過於藝術性，不太容易讓人親近。不過，因為並沒有會議場景的照片存世，所以蠟像師與銅像藝術家都是發揮想像力進行了創作，這一點兩者並無很大差別。這些暫且不論，我曾在2004年12月看過這蠟像室，當時頗覺訝異的，是15具蠟像中竟有尼克爾斯基(左圖標記「×」的人物)。尼克爾斯基曾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出席「一大」，蠟像群中有他也是自然，但當時參會的15人當中，唯獨未曾找到他的照片。後來在俄國學者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尼克爾斯基的照片，那已是2007年的事。於是我曾詢問紀念館工作人員，當初尼克爾斯基的蠟像是怎麼做出來的。

回答令人震驚。那位工作人員苦笑道：「有部講中共建黨的電視劇，就照着那個演尼克爾斯基的外國演員做的。」這可真是本末倒置，令我瞠目結舌，但同時我也對他們深深同情。中共建黨和「一大」的資料原本就極為稀少，而黨和人民卻希望能忠實、栩栩如生地再現當時場景，為了作出回應，而不得不進行這種捏造和假冒。2007年發現尼克爾斯基的照片時，最喜悅的無疑是「一大」會址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們，因為不需要再繼續這麼糊弄了。尼克爾斯基的蠟像當然要重新製作。再後來，展廳更新之際，乾脆換

成了更具藝術性和抽象性的白銅雕塑，或許也是因為館員們意識到追求寫實場景的局限吧。

就這樣，每回造訪「一大」會址紀念館，都收穫了許多有形無形的恩惠與知識。正是基於這樣的經歷和體驗，這次增訂版中，比起「一大」本身，更關注紀念「一大」的方式，並對之加以分析。在研究資料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俞先生之外，任武雄、陳紹康、陸米強等黨史研究領域的前輩學者們也曾對我這樣的日本年輕學生表示熱烈歡迎，並提供各種各樣的資料，對我的提問與要求也作出了熱心的回應。另外，張玉菡、韓晶等年輕館員們也通過研究交流為我的研究提供了諸多支援。當然，熱心幫助我的海內外學者還有很多，在此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請允許我向他們致以深深的謝忱。

通常，翻譯著作都會在序文或後記裏向譯者致謝。令我至為痛憾的，是如今再也不能向本書譯者傳達謝意。本書譯者袁廣泉先生（江蘇師範大學副教授）不幸於2020年5月因心肌梗塞突然辭世，享年57歲。本書初版能得到許多讀者的善意，並獲得很高的評價，離不開袁廣泉先生精湛的譯筆。本書初版刊行之後，袁先生又承擔了我的論文集（《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裏》，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的翻譯工作。2020年3月剛出版的《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同樣出自袁先生的譯筆，豈料隨後竟傳來了他的訃聞。有關本書再版的修正細節，他也曾整理了筆記，以期萬全之備，然而卻未及見到重版之日，就溘然而去。失去袁先生這位我最為信賴的譯者——不，最為信賴的共同研究者，我極感痛楚。

袁先生離世後，本書修訂部分當中2020年後的增補之處均由瞿艷丹翻譯。她在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以中國近代醫療史研究取得博士學位，現在是京都大學的人文學連攜研究者。或許她作為

散文家、作家蘇枕書要更有名。如今，在有限的時間裏，她以不遜於袁先生的熱情完成了翻譯工作。如果是單獨翻譯，那麼可以用自己的文體，而這次因有袁先生的譯文在前，就必須與之參照，斟酌譯文，這並非簡單的工作。若沒有她真摯的努力，本書也不會完成，在此深表感謝。

最後，我要向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同仁們致以衷心的謝意。尤其感激陳甜、彭騰兩位編輯，以及為封面設計花了許多心思的何浩老師。陳編輯自從2015年出版《中國近代歷史的表與裏》以來，一直對我的著述活動寄予絕大的鼓舞和支援，並促成了本書的再版。若沒有她，這部增訂版書稿恐怕要一直在北京出版審查部門的哪個倉庫裏，不知塵封到幾時。為使本書盡快出版，彭編輯不辭勞苦，付出了極大的心力，給予了非常專業的幫助和支持。

有關中國共產黨的狀況及相關研究已增加了諸多艱難。在這樣的環境裏，這部增訂版會引起怎樣的反響？我衷心希望中文世界的讀者們給予本書坦率的意見。

石川禎浩於日本京都

2021年6月

【主要書評目錄】

- (01) 曾成貴：〈中共創建史研究的他山之石〉，《江漢論壇》，2006年第5期。
- (02) 田子渝：〈史料頗豐的中共創建史研究〉，《百年潮》，2006年第6期。
- (03) 汪文慶：〈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幾點不同意見〉（蕭超然教授採訪錄），《百年潮》，2006年第6期。
- (04) 占善欽：〈一部精心考證的創作之作——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評介〉，《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05) 丁曉強：〈關於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一則考證〉，《光明日報》，2006年7月31日。
- (06) 馬長虹：〈從一處人名糾錯到一部新史書〉，《光明日報》，2006年8月15日。
- (07) 朱文通：〈也談對「淵泉」不是李大釗筆名問題的考證〉，《光明日報》，2006年8月28日。
- (08) 吳二華：〈關於「淵泉」不是李大釗的考證問題之我見〉，《光明日報》，2006年8月28日。
- (09) 許全興：〈有關「淵泉」的考證及其他——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一點評論〉，《光明日報》，2006年8月28日。
- (10) 李丹陽、劉建一：〈新視野下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起源研究——石川禎浩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評介〉，《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 (11) 任武雄：〈評介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6輯，2006年12月。
- (12) 吳二華：〈誰更早考證出了「淵泉」不是李大釗？——兼與石川禎浩先生商榷〉，《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6期。
- (13) 張靜如：〈從「淵泉」不是李大釗筆名說起〉，《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6期。
- (14) 田子渝：〈《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是非的三個問題〉，《黨史研究與教學》，2007年第1期。
- (15) 陳永發：〈書評《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7期，2007年9月。
- (16) 吳二華：〈關於「淵泉」筆名的學術史考證〉，《史學月刊》，2008年第1期。
- (17) 李永春、張海燕：〈「改造聯合」與「社會主義青年團」不是同一個組織——與石川禎浩商榷〉，《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5期。
- (18) 許全興：〈學風與方法——對田子渝先生遲到的回應〉，《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3期。

- (19) 朱成甲：〈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與李大釗歷史作用問題的探討——兼評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有關論述〉，《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
- (20) 田子渝：〈也談學風與方法——對許全興先生的回應〉，《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5期。
- (21) 時晨、衡朝陽：〈走進中共黨史創建史的史料之林——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學理論》，2009年第13期。
- (22) 楊奎松：〈《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評介〉，《中國學術》，第25期，2009年10月。
- (23) 王素莉：〈「五四」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若干問題探討——也評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的有關論述〉，《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5期。
- (24) 羅立明：〈《中國共產黨成立史》討論〉，《神州》，2011年第2期。
- (25) 李三星：〈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間與石川禎浩先生商榷——兼論政黨成立的標誌〉，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26) 劉慶：〈論石川禎浩的問題意識〉，《世紀橋》2016年第9期。
- (27) 石超：〈中共創建史研究的匠心之作〉，《南方論刊》2016年第2期。
- (28) 孟婧婧：〈淺讀《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祖國》2017年第2期。